



# 孰谓君死 凛凛犹生

——读卫洪平《张瑞玟传》有感

杨志文

洪平君继2020年《张瑞玟先生年谱》出版之后，又一部研究力作《张瑞玟传》付梓印行。在2026北京图书订货会上，该书在《中华读书报》推荐的30种文学新书中位列第九，可喜可贺！如果从1997年他在《文汇报读书周报》发表长文《张瑞玟其人》算起，他已潜心研究张瑞玟三十多年，令人钦佩！读后感觉该书视野宏大、史料丰富、考证严谨、逻辑严密，用史家的笔触，将清末民初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才情、风骨、性格和功业，全面系统地呈现出来，一个铁骨铮铮、特立独行、正气凛然、敢作敢为、才华横溢、情系家国、进退自如的高大形象跃然纸上，生动立体丰满，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张瑞玟先生活跃于清末民初的政坛文坛，其生平功业和诗文书画，曾长期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中，鲜人关注。洪平君对乡贤文化情有独钟，积三十多年之力，艰难收集相关资料，工作之余熬油费神，爬梳剔抉，钻研不辍，可谓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他却乐此不疲！

历史资料收集达到一定程度，史家便有了书写历史的冲动。但是历史事实与历史书写不是一回事，历史书写比收集历史事实更难、更艰苦。因为历史事实是死的，而让历史事实说话的是历史学家。这就有一个历史观的问题。每一个历史学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不同的历史观指导下进行历史的书

写，不同的历史观对历史的书写肯定是不一样的。

坚持什么样的历史观，是摆在洪平君面前的一个首要问题，也是书写的灵魂及其科学性的基础。洪平君在后记中写道：“决意遵守中国史学传统，写一部‘实录’”。探源张瑞玟先生的人生选择和思想轨迹，竭力探究其“迹”和所以“迹”。这种实事求是的对待历史的态度，重实证、说实话、求信史的传统精神，既反映了洪平君正确的历史观，也为该书的科学性提供了保证。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历史的本质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就是历史活动过程中的事件和人物，有活动必然有过程和结果，这就是历史实实在在的的内容和事实。历史分为历史事实和真实。历史事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具有客观性；历史真实是历史学家书写的事实，是经过筛选和过滤的历史事实，具有主观性。唯物史观认为二者是统一的，具有同一性。历史学家书写的历史事实，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客观的历史事实，是衡量一部历史著作科学水平的尺度。只有忠实于历史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洪平君的《张瑞玟传》便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立场、观点和方法。

张瑞玟(1872—1928)，字衡玉，号老衡、翔野人，山西赵城(今洪洞县赵城镇)人，光绪癸卯(1903)进士，历任陕西韩城、长安等地知县，以宰官身份秘密

加入同盟会，参与组织陕西辛亥革命。民国时期，担任山西首任财政司长，署山西民政长，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黎元洪总统府政治顾问。1917年响应孙中山号召南下护法。1919年南北议和，以“德望素著”，被南北政府首脑和双方总代表公推为赴陕西西陲视察划界专员。后回归故里终老。

《张瑞玟传》将传主置身于清末民初急剧变化和风云激荡的社会环境中，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及各类人物交织互动的社会关系，将浩如烟海、碎片化的各类史料拼接组合在一起，将张瑞玟先生在民族危机之时参与和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及自身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以时间为轴，一一呈现出来，让我们看到一个集“文士之笔，辩士之口，循吏之心，侠士之挥霍，廉士之操守”的“谔谔一士”张瑞玟；看到一个敢作敢为痛斥袁世凯“义声震天下”的张瑞玟；看到一个兴教育、办实事、掌财政的实干家张瑞玟；看到一个不畏艰险、置生死于度外，且智勇双全、“骑虎”西行赴陕划界的张瑞玟；看到一个诗文书画兼优，特别是文笔犀利、直抒胸臆、嬉笑怒骂、酣畅淋漓、读之令人拍案叫绝的张瑞玟；看到一个中西兼学、经世济用、为官清正、做事“明决”、心系天下、充满家国情怀的张瑞玟；看到一个耿直铁骨、好酒乐友、超然洒脱、乐善好德、人格高尚的张瑞玟；看到一个顺应潮流、与时俱进、投身革命、勇于担当的张瑞玟；看到一个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庙堂与江

湖之间充满矛盾、挣扎与坚守的张瑞玟；看到一个不贪名利、进退自如、归隐田园、落叶归根、造福桑梓的张瑞玟！

从全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洪平君对张瑞玟先生的崇高风范，充满了热爱、钦佩和敬仰，研究学习弘扬张瑞玟先生的精神，已成为他的另一种事业。但是洪平君在书写中并没有将感情置于事实之上，而是坚持了“信史”这一中国史学传统和唯物史观的历史观，“设其身以处其地，揣其情以度其变”，实现了历史事实与历史史实的有机统一。

正由于此，一个可亲、可敬、真实、生动、立体的张瑞玟先生的光辉形象，栩栩如生地站立在我们的面前。他不是一尊塑像，而是一个有血有肉、可感可触、有温度、有情怀的似曾相识的人，我们可以与他交流对话，谈诗论画，开怀畅饮，踏雪寻梅。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育才造士，为国之本。”我国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制定了一系列培养选拔的标准和制度，如举孝廉、九品中正制及影响更广泛持久的科举制度。德才兼备、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等，既是人才选拔的标准，也是每个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做人的标准。

张瑞玟先生对“作人”十分重视，他说：“予只作人，人字上不愿系铃铛子。”还自称“书不如画，画不如诗，诗不如其为人”。从表面上看，张瑞玟先生是不招摇、不虚夸、不贪图虚名、不为人言所惑，走自己的路；但其背后则是对原则、底线、道义和信念的坚守，是对高尚人格的追求。尽管他诗文书画兼优，但与“作人”相比，只不过是其在人格的外在表现，不可与其“作人”这一根本相提并论。这一思想不只张瑞玟先生所独有，也是传统知识分子乃至中国人共同的精神追求。(上)

## 丈人峰和禅房寺砖塔

陈正

丈人峰和禅房寺砖塔，是云冈区的地标。丈人峰，峭然壁立，雄伟的山体犹如一位堂堂男子汉，挺立于群山之间。而禅房寺砖塔，就静立在丈人峰之巅，默默诉说着千年的故事。

我出生在山下农村，距离丈人峰几里之遥。小时候，我常常站在村头田间，仰望那座直插云霄的山峰，心中总是涌动着莫名的喜悦与向往。直到八岁时，我和几位伙伴结伴，冒险从东部陡峭的山坡攀爬，终于登顶一探究竟。当时正值春日山桃花盛开时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满山春色中，我站在峰顶，望着山下那广阔天地，心中充满了登顶的自豪和对外面世界的向往。

在塔下，我们在悠扬的风铃声中绕塔观瞻，砖塔独特的造型和塔身精美的雕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长大之后，每次从他乡归来，我总会不经意间望向那山那塔，望见它们，便心安了，确定到家了。

禅房寺砖塔历史久远。据明正德《大同府志》载：“禅房寺，在府城西南五十里，唐天宝间建。”清顺治《云中郡志》载：“禅房山，城西南六十五里，上有寺塔，皆创自辽。”清道光《大同县志》载：“禅房山，在月窟岭南，距城六十五里，山阳有禅房寺，今已圯废。塔几山，在禅房山南，距城七十里，一名

丈人峰，山势峥嵘，上建七级浮屠……”清人有诗《晴眺塔山》赞曰：“塔建丈人峰，千寻耸笔峰。上方时响铎，下界不闻钟。古刹留唐殿，苍苔护汉松。新晴凭仰止，窈窕翠微浓。”2006年，禅房寺砖塔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许多从山下走出的人与此山此塔缘分深厚。从山下榆林村走出的大同教育学院教授李国美，曾创作过两幅以丈人峰和禅房寺砖塔为题材的油画。我在网上看到这些作品，倍感亲切和喜爱，曾有意收藏，可惜未能如愿。

去年春节期间，禅房寺砖塔首亮亮化工程，沉寂千年的古塔焕发了新的生机。夜幕降临，柔和的灯光缓缓铺洒塔身，千年古塔风姿绰约、流光溢彩，惊艳了游人。一时间媒体纷纷采访报道，禅房寺砖塔成了网红打卡地。

遗憾的是，如今只见砖塔不见寺；禅房寺已无迹可寻。听闻丈人峰所在的上窝寨村计划与驻地企业合作植树种草恢复当地生态，修复禅房寺，且已经修建了一条直通山顶的道路，方便游客前来游览。假以时日，游客可以在寺塔之间觅幽怀古，在丈人峰上望星空、观日出、赏雪景、看桃花，山下还有采摘园、农家乐、民宿等可以体验农家生活，这里将成为繁忙都市生活中一处理想的休闲胜地。

## “调御丈夫”匾和它背后的故事

刘冬

在大同古城内，保存有一座始建于辽代、盛隆于辽金两朝的皇家寺院华严寺。大家走进华严寺，都会对那气势雄浑的建筑、精美绝伦的彩塑、工笔细腻的壁画赞叹不已，而那块上书“调御丈夫”的匾额，也让许多人印象深刻，它的背后蕴藏着明朝一个将门世家的忠烈故事。

这块匾悬挂于大雄宝殿檐下，由9块条形木板榫接而成，历经400多年的日晒风蚀，散发着古朴的气息。匾上“调御丈夫”四字为行书，出自明朝时曾任大同参将的马林之手，笔力遒劲，结体谨严，实有大将风骨。

马林(约1560—1619)，蔚州(今河北蔚县)人，明朝名将马芳次子。马芳历任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屡立战功，《明史》称其“威名震边陲，为一时将帅冠”。马林虽出身于将门世家，却自幼雅好文学，既博通经史能诗工书，又能披甲执锐镇守边关。《明史》载，马林以父荫累官大同参将，万历二十年(1592)以制敌有功升副总兵，万历二十七年(1599)任辽东总兵，后因故被弹劾夺

职，发配戍边，久之遇赦免。

万历四十六年(1618)，后金起兵反明，辽东边境告急，马林被重新起用为辽东总兵。他在从蔚县老家赴任途中路过大同，特意去华严寺礼佛，并提笔写下“调御丈夫”匾额。

“调御丈夫”是佛陀的十号之一，意指佛陀大慈大智，能够以种种方法调伏众生心性，教化引导众生。马林以此题匾，既表达对佛法的敬仰，也寄托了身为边关统帅整顿军心、保家卫国、祈愿和平的家国情怀。

万历四十七年(1619)，萨尔浒之战爆发，马林率北路军出征，大军行至尚间崖时，西路兵败的消息传来，马林选择暂缓行军，在尚间崖结营，采取守势。后金主力赶到后，北路军奋力抵抗，马林的两个儿子马燃和马熠战死，马林仅率数骑逃脱，退守开原。同年6月，后金大军突袭开原，城破之后马林率领军拼死抵抗，最终战死沙场。

这块匾额，不仅是马林留在大同的珍贵墨迹，更见证了一代儒将的风骨、一个家族的忠烈传奇。

## 扬州慢·回望故乡

溪山清远

巷口风轻，老墙影瘦，石阶几度曾行。望炊烟袅处，忆笑语盈盈。自挥手、长车催发，故园门掩，灯火昏冥。渐天涯、枯草连波，都是离情。

稚时路畲，科而今、荒了心程。纵旧树犹存，青痕尚在，难觅前踪。客驿笛声吹彻，寒窗下、独对孤檠。念此身长寄，余生只怕，空数归程。



芦花夕照

盛近摄

在岁月的长河中，大同老一代工人实干创业、实干兴业，留下坚实的奋斗足迹，铸就了大同工业的辉煌。王生华就是大同工业战线一位走一处、成一处、胜一处的实干家。

王生华，1930年出生，山西繁峙人，1947年参加革命工作，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起先后任大同市皮毛厂计划股股长、第一副厂长、代厂长，1955年3月至1957年6月任大同市工业局计划统计科科长，1957年7月至1964年6月任国营大同市木材厂厂长、党总支书记。1959年，面对木材异常紧张的困难，他提出了节约用材、综合利用、寻找代用品、大搞来料加工和协作的“节、综、代、来、协”五字诀，全厂上下用“铁肩膀”扛起“硬任务”，用“硬骨头”精神啃下“硬骨头”，完成了难以完成的生产任务。在全市工业战线以机械化、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他在全厂组织开展了“双革”红旗竞赛，以“双革”促生产。职工设计制造出土机器30种、152台，分别提高效率2~25倍，并革新技术16项，生产机械化程度由65%攀升到80%。1959年1至9月，生产指标由原来大有落空的危险一举变为超额14.2%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计划，工业总产值比3年前增长15倍，成本降低33%。由于成绩优异，大同市木材厂被评为全省标兵厂。同年10月25日至11月8日，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大会(全国群英会)在北京隆重举行，王生华作为大同市17个先进集体代表之一，光荣地出席了这次盛会。

1960年，他认真贯彻省委、地委、市委工业会议和全市群英会精神，继1959年全厂开发刨花板、麻黄纤维板、木质

# 大同工业战线的实干家王生华

高旭东

纤维板、活性炭新产品后，又推出草质纤维板、菱苦土制品、塑料贴面板、电木粉等多种新产品，因陋就简建成了纤维板、活性炭、木粉、菱苦土4个新车间。尤其是木粉车间实现了全自动化，一班生产两盘磨，仅用两个辅助送料工，日产1吨，日增加产值400元，不仅把以往锯末废料全部回收利用，还为全市化学工业生产增加了一种主要生产原料。同时，抓住生产关键，先后组织13批共百余人的外出取经队，革新成功包装机、打光机等96台，极大地提高了效率，机械化程度跃升到93.18%。到9月5日，全厂提前117天超额完成了全年国家产值计划，比上年同期增长110.09%。由此，市木材厂成为全市木材工业的龙头企业，带动全市木制品家具产量由1958年的11.62万件增至1962年的14.23万件，全市木材工业总产值共完成2415万元。

王生华尤为重视发挥青年工人不甘落后、乐争上游的积极性，厂里成立了李仕琪红旗青年突击队，全体队员在“双革”和生产中一马当先，勇挑重担，1960年—1961年该队连获省级表彰，闻名三省。

大同市同力橡胶厂始建于1953年，是全省最大的胶鞋生产企业。1964年7月至1975年8月，王生华任该厂党总支(后为党委)书记兼厂长、革委会主任。他狠抓产品质量，既靠制度刚性，也靠执行柔性，让标准落地，让细节说话。

1964年，该厂布面胶鞋合格率、一级品率分别达99.81%和98.77%，比上年提高1.4%和3.11%；胶面胶鞋合格率、一级品率分别达99.35%和97.14%，比上年提高1.89%和12.4%。1965年，全厂胶鞋产量达120.14万双，创工业总产值367.08万元、利润22.76万元。“文革”中，他排除干扰，敢抓敢管，维护了正常的生产秩序。他积极开展创建“大庆式企业”活动，把生产搞得热火朝天。全厂胶鞋年产量由1966年的150万双增至1974年的255万双，产品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把“同力”建成了全省同行业的标兵厂和全市工业学大庆的四面红旗单位之一。

1975年9月至1977年5月，王生华任大同市轻工业局副局长；1977年6月至1983年12月，任大同市轻工业局、第一轻工业局党委副书记、局长。在大潮澎湃的改革年代，他锐意改革，看准了就干。他善抓典型，1979年市综合食品厂被列入全市9个扩大企业自主权首批试点之一；翌年，市酒厂、市色织厂等3个企业进入第二批“扩权”试点之列。1981年6月，他按照全市工交工作会议精神，部署了全系统企业整顿工作，要求列入企业整顿试点的要搞好，未列入试点的要不等不靠搞好自行整顿，推广了市橡胶厂企业整顿的经验，市氮肥厂成为全市第一家自行整顿全系统的地方工业企业。他因企制宜，在全系统推行了六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推广了市利

群制药厂、市棉毛针织厂等企业的经验，并把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与贯彻职代会制度结合起来，把厂际劳动竞赛与开展学上海、学沿海、学先进活动结合起来。为提升专业管理水平，局机关成立了化工、轻工、纺织3个专业科。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中，关闭了产品没方向的市玛钢厂，停止了产品质量次价高、亏损严重的市造纸厂。

王生华常说：“生产要上去，干部要下去。”他经常跑企业、走现场、摸实情，对局属20多个企业都底子清、情况明，对影响生产的问题能解决的立即办，从不敷衍了事；对工作滞后的企业领导，他严肃批评，不留情面。全系统配备了有闯劲、懂经营、善管理的厂长队伍。1981年，局里3次派出12个工作组，由局领导带队蹲点，帮助企业解难题、保生产。这一年，33种主要产品中有28种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其中群众急需的啤酒、毛线、各类水果糖、棉毛衫裤、手推车内胎、庆大霉素针剂和各种片剂等12种产品产量比上年有较大幅度增长；主要消耗指标有22项完成国家计划，15项比上年明显下降，达到历史最好水平的有11项；全局可比产品成本比上年降低0.35%；企业自销产品总额达3122.3万元，占销售总额的56.85%；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达6147万元，比上年增长114.75%，比上年增长7.31%；盈亏相抵实现利润141.2万元，比计划增长37.11%，比上年增

31.13%；全员劳效达7824元，比计划提高10.32%。

他强调“技改是企业后劲，抓技改不能松劲”，“新产品要手里抓一个，眼里盯一个，心里想一个”。1981年，市酒厂啤酒车间5000吨扩建工程，市棉毛针织厂针织、漂染车间，市橡胶厂密炼车间等45个项目竣工投产，试制成功新产品。1987年，全系统新增100万元以上的大宗出口产品有石墨、硅铁、焦炭、安定片、旅游鞋、运动鞋、凉鞋果糖等10个工业类品种，金额达3091.8万元；发展计划外出口产品39种；开发滚动轴承、虫草胶丸、强力枇杷露等15个新出口产品，增加出口货源678万元，占出口调拨额的13.9%；全系统外贸收购额达2.54亿元，比1978年增长

13倍；全年外贸收购额(不含煤炭)首次突破6000万元大关，实现利润72.4万元，分别比上年增长76.2%和126.5%。他抓大户、抓重点，对企业的报表特别敏感，每当看到新的数字时，他总要刨根问底，探个究竟。他多次到大同市出口大户之一的皮毛厂商讨出口事宜。1988年，该厂被轻工业部授予“全国轻工业出口创汇先进企业”。1989年1至11月，该厂出口产品产值达1030万元，占总产值的75%；有1种产品获部优、3种产品获部优出口产品银质奖。

王生华撰写的《努力开创轻工业新局面》《发展我市对外贸易的一些思索》，分别刊发在1982年9月30日、1988年12月22日《大同日报》二版头条，广受好评。

王生华同志在工业战线奋斗数十年，始终服从组织安排，不计个人得失。他多次调动工作，坚持深入生产一线，与干部职工同心协力，善于从现场和数据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不断总结经验、创新思路，形成了独特实用的工作方法，以点带面，推动工作。他勇于担当、锐意进取，用实干和智慧为大同工业发展留下深刻印记，是大同工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他虽已离世多年，但其精神与业绩值得铭记！

(《大同工业史》编纂办公室供稿，欢迎社会各界赐稿，来稿请发至平城书局邮箱：pscy22@163.com)

